

# 城市传播视阈下“唐诗之路”视觉符号建构

沈 珉 麻振斌

**摘 要：**“唐诗之路”是颇具地域特色的文化项目，其立体的建构具有巨大文化张力。文章试图在城市传播的框架下，对“唐诗之路”的视觉符号建构进行探讨，提出建构路径一是对“唐诗之路”的区域文化加以定义，挖掘符号的意义；二是找好各个城市的关键图像/视像，建立符号的层次化布列，进行符号的座标镶嵌与排列；三是展开具体的符号解读；最后是运用其他的符号，进行综合建构。利用视觉传播来推动“唐诗之路”的建设，既是图像转向时代的要求，也是区域文化向外传播的需要。

**关键词：**“唐诗之路”；城市传播；视觉符号；区域文化传播

**作者简介：**沈珉，女，教授，博士。（浙江工商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浙江 杭州，310018）

麻振斌，男，本科生。（浙江工商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浙江 杭州，310018）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 (2019) 02-0009-07

在当下的融媒体传播语境下，技术的发展为视觉的传播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而视觉传播以其形象性与易读性的特点获得了接受者的喜爱，其传播优势被凸显出来。视觉的景观包围着大家，无处不图像，无处不景观。应该认识到，视觉图像文化不仅是线型文化的形态转译，也是新传播的媒介与方式，它意味着传播范式的转换，也带来思维方式的变革。用好视觉传播，对于打破文化的地理分布局限，分享文化的内容以及引导文化共同价值的探索有积极的作用。目前，“唐诗之路”的意义被提升到与“河西丝绸之路”并列的高度，足以说明其在浙江区域文化中的地位。在新环境下，利用视觉传播来推动“唐诗之路”的建设，也可以使其能够为浙江经济与文化的腾飞创造条件，为区域文化的传播作出贡献。

## 一、“唐诗之路”研究回顾与新传播角度

“唐诗之路”有表层与深层两层含义。在表层含义上，竺岳兵先生研究发现，唐代众多诗人“从钱塘江开始沿浙东运河经绍兴、上虞和浙东运河中段的曹娥江古代的剡溪（今曹娥江及其上游新昌江）经嵊州、新昌、天台、临海、椒江以及余姚、宁波、东达东海舟山和从新昌沿剡溪经奉化溪口至宁波”，<sup>[1]</sup>即“唐诗之路”就是唐代诗人游历之路；而深层含义则意味着，“唐诗之路”是包括了文学、艺术、社会文化、宗教等在内的传播之路。

### （一）“唐诗之路”研究回顾

自竺岳兵首倡“唐诗之路”并得到学界认可以来，研究持续近30年。研究者以杭、绍、台高等院校教师为主力，各级报刊为辅军。研究大致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以诗歌为本体的文化解读，如邹志方以景点为主干的唐代诗歌分析；郁贤皓对有唐一代诗人行踪的总体整理；也有以个体游历的介绍如李白浙东游历经过的分析等。而研究角度拓展也为研究提供了新鲜视角，如肖瑞锋比较视野下的中日文学对比、吕洪年从民俗角度对山水文学解读等。

第二个阶段是进入21世纪之后。一方面是对前期研究的深入，另一方面是从当下角度讨论“诗路”的价值。前者，竺岳兵的系列专著充分挖掘了唐诗发展的地域因缘和空间形态。后者，首先拓展

了“诗路”的地域空间，将浙西唐诗之路加入到研究视阈之内，从而形成了更为广阔的考察视角。另外，李跃军等从旅游角度挖掘诗路的古道文化，盛江等关注到了诗路的经济，沈珉关注到“诗路”与浙江茶酒分布的合轨等。这些研究，从多角度挖掘“诗路”的当代价值，更有利于从文化整体的角度进行解读。

但是以上的研究侧重于阐释，而非当下文化传播的需要，因此缺乏与当下“文化走出去”接轨的可能。“图像化传播是后新闻传播业时代符号形式上的显著标志”。<sup>[2]</sup>从传播的角度来说，视觉的媒体能将文化转化为声画符号，通过符号的建构完成意义的建构，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和思想，也就是说，视觉化是当下文化传播的必要途径。

## （二）“唐诗之路”的新传播角度

在视觉角度上对“唐诗之路”进行文化传播，需要有传播的抓手与媒介。这一要求决定了“唐诗之路”传播新视角的建立。本文抓取了城市与视觉符号两个关键词，前一个词指向于传播的载体与表现中介，而后者则指向于文化的操作层面。

### 1. “唐诗之路”城市传播的视角

“唐诗之路”是具象与抽象结合的文化之路，需要在时空性上重新加以思考。空间上，“唐诗之路”是由一串具有共态的城市组成的地理区域；在时间上，“唐诗之路”也具有层累性的特征，也即，“唐诗之路”的形成虽然是在唐代，但绝不限于唐代文化是其唯一的挖掘点：“唐诗之路”是能够反映历时性文化累积的线脉，尤其是唐之前的文化积累。出于文化传播的需要，时间可以依附在空间上得到说明。因此，地理单元是可操作的实体。

芒福德说：“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化力为形，化能量为文化，化死的东西为活的艺术形象和音标，化生物的繁衍为社会创造力。”<sup>[3]</sup>城市不只是一个人口聚集的地理范围，更是可以承载文化的空间、载体、中介与有表现力的单元。具体而言，在“唐诗之路”文化中有几个空间可以开挖，一是物质空间，比如从李白的行踪中可以梳理出唐代诗人的大致行踪，但是这具像的空间缺乏文化建构的可能性；二是文化空间，也就是作为阐释对象的精神空间——这两个空间在“唐诗之路”的前期研究中都得到剖析，但是还缺乏整体性的阐释与更宏观的立意；三是物质与精神可以相嵌的中介空间，这一空间的存在“不仅是为了批判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的思维方式，还是为了通过注入新的可能性来使它们掌握空间的手段和活力”。<sup>[4]</sup>这一特性，在当代的传播中尤为重要。

综上，城市是“唐诗之路”的具体承载者，“唐诗之路”的意义落实必须在具体的空间坐标中加以体现，城市也能够作为传播的文化主体。同时，城市本身具有立体的意义架构，能够容纳多重的文化内涵，这样就能将时间赋给空间，让空间的意义更加丰富。

### 2. “唐诗之路”符号学传播的视角

视觉图像具有穿透文化界限的能力，能够在情感与心理上唤起共通的经验，因此在传播上具有优势。但是仅注重图像叙事是不够的。布列逊认为，任何图像都是有意义的，而意义不在图像之内，而在图像之外。索绪尔认为，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武断的。通过文本与图像（视像）的约定，可以突破语言理解带来的误差，使文化的共享基础扩大。罗兰·巴特则认为，只有从具体的图像开始通过转喻与隐喻才能达到文化的解读。因此，为了使文化的含义清晰，图像的赋权也需要在一定的框架下进行。

“唐诗之路”的传播不能以将其具化为实际的线路为目的，而是要将其放在文化的视野中挖掘。因此，需要对“唐诗之路”表现的区域文化内涵加以定义。首先，“唐诗之路”呈现的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最为基础的核心文化，即天人合一观念下的文化反映论，这是“唐诗之路”文化的核心价值，也是“人文景观走廊”的价值所在。“唐诗之路”的表层意思可以理解为是唐代的诗路，但其文化必须溯源至魏晋时期。在魏晋这一文化自觉的时代，文人由内心转向于自然，寻找自然之道与人性之道的共点，从而形成中国文化精神的写照方式，塑造了中华文化的特质，这需要特别强调。其次“唐诗之路”亦

体现为经济流通之路与文化交流之路。魏晋以后佛教盛行，唐代时日本高僧最澄前来我国天台学习佛法，后回国创立了日本佛教天台宗；江南的丝绸、茶叶与瓷器经古越国都绍兴到古明州（宁波）出海东渡，以成经济贸易的“海上之路”。可见，“唐诗之路”文化既有足够的传统基因，更有开放的基因，值得提倡与共享。

## 二、“唐诗之路”视觉符号的内涵与层次

城市传播视阈下“唐诗之路”的视觉符号建构，是要找好各个城市“关键图像/视像”。“浙东唐诗之路”连缀起浙东一系列的国家级与省级的历史文化名镇如杭州、绍兴、宁波、临海、温州等，以及国家和省级的历史名村、传统村落与古街如永嘉芙蓉、绍兴戴山、嵊州市金庭华堂、临海紫阳街等。各个城市的“关键视像”必须服务于文化整体的解读。按照这样的建构思路，首先是要建立符号的层次化排列，进行符号的座标镶嵌与排列，然后展开具体的符号解读，最后是运用其他的符号，进行综合建构。

### （一）划分“唐诗之路”视觉符号内涵

美国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提出了“文化生态”的概念，这一概念把人类适应环境的生存活动和经济行为这部分文化称为“文化的内核”，而文化的内核决定着社会组织和文化价值。“人类都生存于一个具体的时空之中，这种时空用另一个术语来表达那就是生活于具体的环境中，而且，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不同的环境，这种环境的特点或个性在原始社会时期对人类的文化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并铸造着一种特色文化：而这种特色文化与环境一道又对今后的文化发展起着规定的作用。”<sup>[5]</sup>按照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整体的分析方法，也可以简单将“唐诗之路”的符号系统进行以下划分。

#### 1. “唐诗之路”物质内涵

浙东“唐诗之路”属于越地文化的范畴，“唐诗之路”是由“运河文化”转至“山林文化”又转向“海洋文化”，是三个地域板块的结合。在建构这一视觉符号时，要关注浙江山水文化的特质，需要将浙东的水域延伸与文化的延伸结合起来。东晋时期，由于西陵堰与柳浦堰的修建，钱塘江航运与会稽水道得以沟通，钱塘江也与鉴湖、曹娥江、姚江等相通。这样，基于“运河文化”的古石桥、古堰坝、古纤道等遗址需要进行归纳与整理，同时也要注意梳理水路边商贸集镇的分布；在“山林文化”的版块中，古驿道、古关隘等需要进一步地梳理，因此也要求对陆地交通要道的历史作进一步的挖掘；在转向“海洋文化”的版块中，需要注重的是古出海口、古代灯塔以及海防设施的挖掘，因而而要求注意古代外向型城市的文化积淀以及海防文化的进一步深挖。同时，山林文化也可以从另一角度进行挖掘，如会稽山、天姥山、雁荡山、桐柏山、天台山、括苍山等另一角度的挖掘与认知也成为必要。

#### 2. “唐诗之路”经济内涵

在秦汉之前，上述地域虽有春秋时期建立的越国，但经济的发展仍落后于同时期的中原，此一时期酒文化得到了发展。魏晋之后，由于定都建康（南京），剡溪一带成为了当时皇族与权贵的后花园，会稽的经济得到发展。隋唐以后，“太湖文化”文化圈兴起。到了唐代，隔江相对的绍兴与杭州成为政治与经济中心。杭嘉湖一带经济得到发展，丝绸业成为全国的特色产业。据记载，唐武德年间，浙江多个州县都有不同的丝绸产品上贡。同时，茶业在唐代也得到发展，唐代即有名茶紫笋茶、东白茶与鸠坑茶；宋以后，名茶倍出，杭州市的径山茶、绍兴日铸茶、温州雁荡茶等均是国内有名的好茶。唐宋以后，浙江的瓷器生产发展较快。唐代时，越窑的青瓷代表了当时南方的最高水平，以上虞、余姚、宁波生产为盛，其他如绍兴、镇海、临海等也有生产。宋代的龙泉青瓷则将青瓷生产推向了高峰，在品种上不仅有皇室使用的官窑，也有民间普及的民窑，还有外销的瓷器。此外，当时的酿酒技术也为全国之首，杭州有流香、碧香、思堂春等各色私酿与公酒；绍兴有东浦与蓬莱；台州有吴江风月；温州有蒙泉与丰和；明州有金波与双鱼等。在品种上，不只有白曲酒，也有红曲酒。



同时诗路还具有外向型经济的基因。明州港、杭州港是浙东主要的外向型港口，两市舶司设于北宋。南宋时又设温州市舶司。丝绸、瓷器是当时的出口大件。浙江特产的丰富，提供了对外商贸的基础。因此，在考察物质层面的细节时，尤其要注意茶、酒、纸等传统文化符号与“诗路”的对应关系。<sup>[6]</sup>

### 3. “唐诗之路”社会行为内涵

“唐诗之路”主要体现为由朝圣与“壮游”“隐逸”结合的游历行为。

唐代朝圣地有两处，一为浙江天台，一个是山西五台山。唐代的文人到天台朝圣，一是符合当时的信仰要求，二也是追慕唐代著名的道人司马承祯。司马承祯在武周与睿宗、玄宗时期得到朝廷的赏识，<sup>[7]</sup>但他大多时间还是选择离开都城隐居，天台是其隐居之地。李白到浙东天台也是为访司马承祯。“诗路”形成，还与唐代文人“壮游”的风尚有密切的关系。在“安史之乱”后，北中国都在战火之下，而江南一地成为安静祥和的后方，诗人慕名追随魏晋名士游览浙东，是对当朝时局的反映。“诗路”也是贬官文化的表现。相对于中原的繁华，浙东是原始的；相对于中原的核心地位，浙东是边缘的。这种特殊性既能说明浙江的地域特征，也能对壮游者的身份背景有更深入的理解：唐诗之路的践行者，多包括浙江籍的诗人、被贬入浙地的官僚以及想在浙地隐居的文人等。李白诗云“此行不为鲈鱼脍，自爱名山入剡中”的诗句很明显地标志出“剡中”所代表的文化符号。

### 4. “唐诗之路”文化内涵

由上所述可知，避世与隐居是“诗路”开始的初因，因此浙东“唐诗之路”是中国文化传统核心中最原初也最典型的区域，这一带集中体现了天人合一思想下的文化价值的思考。王羲之与谢灵运是这条诗路文化的核心人物。东晋书法家王羲之不止在绍兴兰亭集会，留下艺术史上不朽的作品《兰亭集序》，而且也在天台、雁荡与永嘉留下行迹。而出生于始宁（上虞）的谢灵运更是后人仰慕的山水诗人，他在任永嘉太守之际，游遍了永嘉的大小诸县，现在乐清雁荡山、永嘉孤屿、青田石门山都有其留下的诗篇。谢灵运的《山居赋》不只是对浙东会稽山与四明山一带山水的自然写照，也是对浙东神幻文化的总结：“远东则天台、桐柏，方石、太平，二韭、四明，五奥、三菁。表神异于纬牒，验感应于庆灵。”表现出此地山水是凡俗与仙境之间的过渡，也是魏晋文人心中向往之地。中国最早的泼墨山水也诞生在浙东，同样是对这一带山水形状的极好的描绘。

诗路上的摩崖石刻形成了深刻的文化记忆，比如贺知章《龙瑞宫记》石刻、桐柏山摩崖石刻、嵎浦潭摩崖石刻、石梁摩崖石刻等。

### 5. “唐诗之路”思想内涵

“唐诗之路”在魏晋以后成为三教流传的地区。西晋元康年间，天竺僧人在宁波太白山麓创建天童寺；东晋咸和元年（300年），天竺僧人慧理到杭州建灵隐寺。当时杭州、绍兴、天台、宁波一带寺庙达200多所。杭州的径山寺、天台国清寺、临海龙兴寺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意义都非常重大。不只是佛家寺庙大量存在，道家的洞天福地也在这一带有所分布，尤其是天台山被称为“佛宗道源”，南朝陶弘景《真诰》中有详细记录。这一带吸引了众多名士前来，其中就有道教理论家顾欢。作为中国本土的信仰，仙道文化在此带也密集流传。另外，这一带还有儒家孝道文化与开放经济思想的流播。地方神祇的多样性折射出地方的特征。这些精神层面的密集性交织，折射的是浙江区域文化的多元内核建成。

## （二）建立“唐诗之路”视觉符号层次

按照城市传播的符号体系，可以将沿线城市作为横轴，将上述几个层面进行具体挖掘并落实。上述几个层面可以具体体现为地标（代表性建筑、代表性景点等）、饮食与特产（特色饮食及饮食习惯）、风俗与传说（特有节日风俗节庆）、人物及特征（代表性人物及其市民代表性特点）、文化（文学、艺术等）以及产业（知名的、有代表性的产业）等视觉符号。

### 1. 地标景观层次

在自然与人文景观中，要注意后者对前者的标注与文化的揭橥。水域与山道是诗路的中心，重要的

地理标志是山水道的文化记忆。就水路而言，钱塘江边有柳浦港与西兴港，展之有越王山；古镜湖（鉴湖）边有马臻墓、大王庙，展之有中国唯一洞天福地双栖处（阳明洞为第十洞天、若耶溪为第十七福地）龙瑞宫；剡溪边有艇湖塔、戴逵滩等；陆地山林中，为了行游，谢灵运曾以始宁为起点，伐木开径七百里，成为剡中浏览的通路，即为现在嵊州过满港岭至车骑山一带的古道，附近有勒书岭古道。另外，天姥山有天姥古道、四明山与天台山间有王罕岭古道、天台山有霞客古道与关岭古驿道、剡西瞻山脚有古代要通冲廿八都等。人文景观中佛寺庙观等的存在见证了这一带丰厚的文化沉淀：新昌有建于东晋永和年间的大佛寺，鄞县有天童寺、天台有智顗创建天台山十二古刹如国清寺、高明寺等，中国道教东南圣地桐柏宫、鸣鹤观等。沃洲山有纪念抗金名将宗泽真君殿，剡西有祭祀晋诗僧竺道猷的古刹瞻山庙，新昌儒岙镇有祭祀大禹的彼苍庙，曹娥江边有祭祀孝女的曹娥庙等。

## 2. 饮食与特产层次

司马迁曾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作过扼要的记述：“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这是南食的基本特征。但在饮食中，浙东的饮食透露着丰富的地域特色。比如食笋的普及是江南的地域使然；绍兴一带“状元肉”承载着科举文化的因子；“手擀面”等种类丰富的面食品透露着南北文化碰撞以及行商文化的信息；“麦糊筒”等则提示着海防文化的消息，等等。

在特产中，茶、酒、丝绸与瓷器是值得挖掘的符号。另外，比如纸文化符号中，唐之前的剡纸、宋代敲冰纸、明以后开化纸等则勾勒了纸开发的过程，表现出文化发展的递进关系。

## 3. 风俗与传说层次

这些风俗传说，有以人物为主的传说，比如萧绍平原的黄酒文化传说，曹娥江一带孝文化传说，温州一带的郭璞传说；代表地方神祇文化的黄初平传说、代表仙道文化的阮肇入天台、寒山拾得与济公的传说以及绍兴、嵊州、上虞、余姚一带的尧舜禹上古传说等。特别要注意的是传说的密集交织现象提示着浙东在历史上作为完整地理单元的痕迹：比如会稽山有虞舜巡狩台，上虞有大舜庙，姚墟在余姚；又如，绍兴有禹穴，嵊山又称禹山，有禹亭、禹岭等遗迹等。

同时又有相关于地名的传说，比如杭州西湖的传说、温州孤屿传说、天台山的传说等等。

“唐诗之路”沿线的风俗表现出这一带文化的特殊性与开放性。比如萧山一些地方的“半年节”，是商历纪年的遗留，与福建、台湾的风俗相通；临海一带的元宵不在正月十五，与海防文化相关。

## 4. 人物故事层次

密集的人物故事有魏晋风流、佛道人物故事等。

魏晋时期，权贵为远离争斗，纷纷选择了离建康较远的剡中作为栖息之地。剡溪一带豪族庄园林立，也流传着魏晋风流的故事，比如剡溪艇湖即为晋王子猷雪夜访戴回艇处。据《晋书·王徽之传》云曰：“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初霁，月色清朗，开室命酌酒，四望皓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房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安道耶！’”至今还有“子猷桥”、“房戴亭”、“洗履桥”、“招隐桥”等古迹。沃洲湖水帘洞为东晋时国师竺道潜结庐之地，后支遁买山隐居，也在此地，因此沃洲一带流传着支遁的故事与诗歌。王羲之辞官后在现嵊州市东建金庭庄园，度过其生命中最后的八年，现仍有王羲之墓、金庭观等遗址。谢灵运之建始宁墅，现留有谢车骑坐石、宝积寺等遗址。

道教人物故事。会稽山禹穴旁就有葛玄、葛洪求仙炼丹的遗址。嵊州市境内的西白山有三国魏末炼丹家赵广信留下的赵广信丹井，其弟子胡圣在不远的叠石岩炼丹。葛玄在西白山发现了跌打良药葛英，其后代葛洪也在炼丹，留下葛仙翁丹井。天台山有顾欢曾开馆授徒，现仍有“顾儒岭”、“欢岙”、“欢山”、“欢溪”等地址，天台欢岙还有“顾欢墓”。另外，郭璞的故事、唐代高道司马承祯的故事也有一定的流传度，如相关的天台司马悔山（是其后悔出山而在此下马的地方），司马悔桥（又叫落马桥，在新昌仙桂乡班竹山，古十九都，是其后悔出山而回头的地方），另有司马庙，也在十九都，是祭祀司马承祯的。

佛教人物故事。唐代日本高僧最澄先至临海龙兴寺、后至天台学法,然后在上虞峰山灌顶授法,峰山道场亦成为日本国教的发源地。

儒学中著名的浙东学派亦是浙江文化整体的主要构成部分。浙东学派以北宋“永嘉学派”为始,学说批判了“农本商末”、“重义轻利”的儒家传统观念,提出“夫四民(农工士商)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的新价值观,其“经世致用”的观念对浙东历史文化传统的形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才出现近代孙怡让这样的学问家与实业家。

### 5. 产业与经济层次

研究关注到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水利建设对浙江特别是浙东经济的影响,西湖、鉴湖的疏通以及堰坝设施的建立对经济格局的影响。

浙江的温商、甬商与杭商则代表了不同的行商文化,各自依借了地域的差异,进行各自支柱产业的建设。排找出具有特色的产业,进行分析,将这些符号进行排列,就能得出关键视像的分布图。

## 三、“唐诗之路”视觉符号的建构

“唐诗之路”的图像化传播,需要对视觉符号进行解读,分析“关键意象”符号的构成,从而将纯粹的解读转向于建构与传播。

### (一) 分析“唐诗之路”关键视觉符号

按照符号的意义分析,符号的意义不只是在能指与所指中寻找解释项,更应该将“直接意指层”上升到“含蓄意指层”<sup>[8]</sup>的说明,从而将符号与文化进行关联。“唐诗之路”的当代意义是其区域文化的特色解读,因此在传统文化符号的罗列中,要将关注点放在能指与所指的意义串读中,要适应运用“意串”与“系列”的概念,进行视觉图像分析。

在这里,“意串”意味着在文化整体中,从形式层面向精神层面递阶发展过程中的符号选择。比如天人合一的文化观念,在景物刻画中,正是有了水这一符号的多样态呈现,才使得浙江山水景观有了特殊的意味;在艺术表现中是泼墨山水的流畅与自由,以及水天一色的精神元气的弥漫;在诗文中则是迷离而神秘的心境描述,这种原境的表达与李白这样非本土诗人的文化表白进行碰撞时,则产生了瑰丽、夸张的文学抒情;在物产中则是禅茶的流行;在思想中是禅宗的领悟等等。

而“系列”则表现为对象的替代与区域的差异。比如禅茶系列,就有杭州市径山茶、新昌大佛龙井、天台华顶茶等;而茶系列中引入的葛玄、陆羽、释皎然、僧圆等的传说,又构成人物符号系列;通过茶的传播,又建构了茶文化传播的子路径,如运河文化传播与海洋文化传播等。瓷器的符号同样存在着替代更新以及支流化传播的问题。

这样,通过符号中能指的转换与替换,以及所指的同一性说明,就能在反复中进行强调与建构。在“唐诗之路”的语境下,还需要注意的是符号的叠加与转换形成的整体意义。比如要关注魏晋庄园与宗教场所的叠加效果,比如王羲之旧宅与金庭观、王献之旧宅与云门寺、支遁旧宅与真君殿的转换,只有放在符号的串读中,才能理解文化的纵向发展过程。

### (二) “唐诗之路”视觉符号体系架构的路径

符号的生成还需要运用文本、图像与视像的互动。因此,在对符号进行挖掘的基础上,提炼主题、讲好故事成为符号串连与逻辑意义实现的途径。

#### 1. 城市传播的层次建构

利用城市的文化辐射力量,在城市传播的视阈下,进行三个层面的视觉符号开发是有必要的,城市的开发层级为:作为实体的城市、作为媒介的城市与作为载体的城市。

在实体层面,要注重城市的实体符号建构,因为城市的任何一个物体都成为文化的容器,收纳着文化的信息。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中曾说:城市不复存在,唯有作为吸引游客的文化幽灵。城市建筑小品的制造、公共空间的营建,以及景区的设计等。在这个层面上,城市既是符号,也



是文本。在设计上均需要有一个统一的主题，在艺术形式上保持一致，尽量向地域文化的核心意义靠拢，实现视觉上的高度统一。

第二个层面是作为媒介的城市，要充分借用城市的虚拟空间。芒福德认为城市能够建立与周边的城镇乡村的一种互惠关系，博物馆等公共文化空间中的影像、书籍等可以将更多的时空网络纳入一个系统之内，制作主题宣传片将诗路的总体情况纳入不啻是一个好方法。由于古代行政地理与现代行政地理的变化与迁移，实体空间更需转向于媒介空间的利用，这样才能形成文化整体进行挖掘。因此，对城市媒介空间的利用价值大于实体空间的利用。

第三个层面是作为载体的城市。城市成为文化的生产地，能够产生巨大的文化附加值。比如，城市能够集中人员进行主题旅游方式的策划、文学作品及IP的打造等，将历史文化符号嵌入；也能产生介于虚拟与现实的“中介式打造”，<sup>[9]</sup>比如对手游与桌游的开发，这样就能打破地理分布不集中的局限，在主题中串连文化意象，形成完整的符号链。而其他行业的互动，可以对视觉符号进行深化与延伸。

## 2. 时空维度的层次建构

空间维度，“唐诗之路”主要是水路的营造。在视觉体系的营建中，一定要有核心的内容，要围绕水体的分布，在亲水空间、舟船文化、水上餐饮以及水道旅游等方面建立立体综合的视觉效果，呈现水上走廊的多彩效果，同时将名胜古迹嵌入到诗路之中。而山路的营造则可以注重传统古镇以及古道的价值开发。目前，一些主题园区的开发以及仿古建筑、名人雕塑的落成已经意味着“唐诗之路”在视觉形象营造上的进步。但视觉形象的营造不是复原，而在于阐释与提炼。因此，除了对已有的景观符号进行阐释之外，还需挖掘一些湮灭在岁月中的符号，如若耶溪、秦望山等视觉符号，同时挖掘诗路的分支以及流传诗歌的内涵，建构浙东独特与优秀的文化符号，使已有的符号增殖，增加一些必要的符号来体现完整性与系列性，而不是无主题、无侧重地开发。

在时间维度上，“唐诗之路”的营造思路需要完成传统与现代的嫁接，以符合不同层次、年龄受众的不同需要。比如在旅游项目中，“寻仙之旅”“爱情之旅”等都是可以构想的项目。在桌游与手游中，寻仙、传说都是不错的主题。在策划时，既要注意符号的提炼，也要注意再度创作。

综上所述，基于城市传播视阈下的“唐诗之路”的视觉符号传播，是服从浙江省文化建设的大目标，围绕“区域文化”重构的思路，剔除诗路中的消极因素，阐释诗路“人与自然和谐”的哲学韵味，对浙东人文历史进行系统梳理与整合的过程。通过一系列的策划，围绕地域文化的主题凝炼视觉符号，挖掘视觉认知价值以及符号交流价值，实现空间意义与精神价值的阐释，进行全方位的视觉符号建构，从而将“唐诗之路”改造为可以看见、感受与认同的文化产品，这是视觉符号构建的目的与价值所在。

## 参考文献：

- [1] 竺岳兵. 唐诗之路唐代诗人行迹考 [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序，2004.
- [2] 杨保军. 简论“后新闻传播时代”的开启 [A]. 张毓强. 新闻学十年（1998-2008）多元与分化 [C].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263.
- [3] [美] 刘易斯·芒福德. 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 [M]. 倪文彦等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419.
- [4] [美] 周敏. 美国华人社会的变迁 [M]. 郭南审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4.
- [5] 史徒华. 文化变迁的理论 [M]. 张恭启译. 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5.
- [6] 林正秋. 浙江经济文化史研究 [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23-78.
- [7] 欧阳修等. 新唐书（第18册） [M]. 北京：中华书局，1975：5605.
- [8] [法] 罗兰·巴特. 流行体系 [M]. 敖军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255.
- [9] 刘娜，张露曦. 空间转向视角下的城市传播研究 [J]. 现代传播，2017（8）.